

黨政會議新聞的市民消費表述－ 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對「兩會」新聞的報導異同

張 裕 亮

(南華大學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全國政協會議」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兩會)一向是中國共產黨例行自我合法化統治權的重要政治集會,因此如何正確報導就成為大陸黨報一項高度政治性的新聞處理工作。本文通過比較市民報京華時報與中共權威喉舌人民日報對「兩會」新聞的報導發現:人民日報大量使用了「建言表態」、「誇耀成就」、「凝聚團結」、「宣示政策」這種傳統從黨國立場出發的宣傳框架;然而在人民日報佔壟斷性地位的主導框架在京華時報中被邊緣化,京華時報轉而採用更多貼近市民閱讀的「傳達訊息」框架,從而解構了「兩會」報導合法化中共政權的「儀式化」功能。

配合報導框架的改變,京華時報在報導方式上引進西方媒體經常採用的解釋性新聞報導、深度新聞報導、調查性報導;同時在消息來源上,京華時報也逐步讓市民、讀者、專家學者發聲,試圖傳遞不同於兩會代表與新華社長期壟斷「兩會」發言下的聲音。不過,京華時報並未建構對抗性的報導框架,使其針對「兩會」新聞發展出這套「市民消費表述」的處理方式,成為市場運作邏輯與黨國制約邏輯下的平衡產物。

關鍵詞:大陸報業、新聞框架、黨政會議新聞、人民日報、京華時報

* * *

一、前 言

在中共的新聞政策中,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遵循的重要法則。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所謂堅持正面的宣傳,「就是要準確、及時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主流,讓人民群眾創造新生活的業績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們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①

註① 李瑞環,「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201。

在大陸黨報報導演進的過程中，最能夠準確、及時宣傳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同時鼓勵人們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者，莫過於黨政會議新聞。從中共官方觀點言之，由於黨政會議新聞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願，關係著各級政府、各行各業的工作，是各個層級、各行各業的黨報所關心的，因此在刊載時都以頭版位置顯著處理。大體上，黨政會議新聞包括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報導，關於國務院頒發的重要法規和法令的報導，關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活動、重要講話的報導等^②。

然而從市民讀者的角度出發，大陸黨報的黨政會議新聞報導往往淪為「全文轉載中央政策文件」、「報導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和活動」或者「就重大問題向黨中央公開表態」的工具^③，根本不值一哂。同時，黨政會議新聞報導型態存在新聞太少、內容太空、文章太長與數量太多的弊端，這四個問題互相聯繫：會議報導裡真正的新聞少，內容自然會空，只能在會議的程序做文章，在出席會議首長的名單上兜圈子，內容空文章自然就會拉長。全文都是會議要求，會議強調等^④。

由於黨政會議新聞報導悖離一般市民的閱讀習慣，使得九〇年代起大陸報業邁進商業化後，一向強調黨政會議新聞報導的大陸黨報發行量急遽滑落，就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來說，極盛時期曾擁有高達六百萬份的發行量，到二〇〇四年已下滑到一百七十二萬份^⑤。這也導致從九〇年代起新興的市民報、都市報不得不改變過去黨報黨政會議新聞掛帥的報導方式，逐步減輕黨的喉舌功能，轉而刊載以市民角度出發的實用性、服務性新聞，強調傳媒的信息功能。

不過，市民報雖然在日常新聞處理逐步減輕黨政會議新聞報導的比重，以爭取市民自費訂閱，但並非意謂著這些多數由省委黨報在省會城市、或者地市級甚至中央級黨報創辦的子報，已經可以卸下宣傳責任，特別是在報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歷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國務院頒發的重要法規和法令、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活動與重要講話等事件時。在此種情形下，市民報針對黨政會議新聞報導發展出一種市民消費表述的處理方式，在顧及對黨中央公開表態謹守喉舌任務的前提下，從市民角度出發，以實用、服務取向報導黨政會議新聞，以吸引市民閱讀。

本文即通過人民日報於二〇〇一年主辦、面向北京市民的市民報—京華時報，針對二〇〇四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與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以下簡稱「兩會」）這種例行重大黨政會議新聞報導的個案，分析其在報業商業化的衝擊下，是採用何種新聞框架進行報導？如何藉此報導向黨中央交心表態，同時又能吸引北京市民閱讀？同時，本文也分析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中共主要輿論宣傳喉舌，同時也是京華時

註② 藍鴻文，專業採訪報導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53。

註③ 陳懷林，「經濟利益驅動下的中國傳媒制度變革—以報業為例」，何舟、陳懷林主編，中國傳媒新論（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8年），頁147~149。

註④ 姜聖瑜，「深入和跳出會議」，新聞戰線（北京），第4期（1999年4月），頁41~42。

註⑤ 「世界日報發行前100一覽表」，新聞記者，2004年6月，<http://xwjw.eastday.com/eastday/xwjw/node23670/node23672/userobject1ai329855.html>。

報母報的人民日報，又採用何種新聞框架報導？本文是希望透過比較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處理的異同，藉此印證報業商業化對黨政會議新聞報導的影響。

二、相關文獻回顧

傳統新聞學裡將客觀報導視為新聞媒體遵守的重要信條，不僅是新聞工作的專業規範，也是主要的新聞專業理念。客觀報導原則強調公正、平衡地處理新聞，並將事實與意見嚴格區分，客觀性原則因此成為報導新聞時處理與呈現資料的標準^⑥。

基於對傳統新聞客觀報導的省思，近年來一些社會建構論、文化研究學者提出新聞框架的理論途徑，認為新聞不是簡單地對社會事實的客觀反映，強調新聞媒體再現真實時是受到新聞組織框架、新聞工作者個人認知框架、新聞文本框架與消息來源的影響^⑦。

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觀之，新聞工作者產製新聞的工作過程就是創造框架，將社會事實轉化為媒介事件的過程。新聞工作者就是通過框架進行信息處理，產製新聞。如同 Gitlin 所說，框架「使得新聞記者得以常規化地迅速處理大量的信息，並且將它們以有效的方式包裝輸出給受眾。」^⑧新聞工作者作為框架的工具包括了詞彙、比喻、概念、象徵、影像等符號工具^⑨，以及句法結構、情節結構、主題結構和修辭結構等結構性的元素^⑩。新聞工作者使用這些框架工具呈現出的新聞文本內容，說明新聞文本內容不但含有價值判斷，新聞訊息產製更是一種語言意義的建構過程。

如同 Pan 與 Kosicki 認為，文本框架同時位在個人心智結構以及政治言說之中，可視為是「建構與處理新聞言說的策略」。新聞文本並無客觀意義，而是新聞工作者組合一些符號設計，與讀者個人記憶及意義建構行為互動後的產物。這些符號設計包括句法結構、情節結構、主題結構、修辭結構。Pan 與 Kosicki 認為，這些符號設計就是新聞文本框架的基本結構；透過這些設計，新聞文本達成了組織事實的特定方式^⑪。

簡言之，新聞文本框架可說就是「將故事整理為一體的中心意旨」，而此一「整理過程」乃藉由選用（或排除）以及強調（或忽略）上述語言結構與字詞達成。總結來說，研究者強調新聞文本乃是一種言說形式，包含了各種符號設計，目的在於透過

註⑥ 彭家發，*新聞客觀性原理*（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1~3。

註⑦ 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67~153。

註⑧ T.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7.

註⑨ R. M. Entman, "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ntrasts in Narratives of the KAL and Air Inc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1, no. 4 (Autumn 1991), pp. 6~26.

註⑩ Z. D. Pan and G. M. Kosicki,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1 (January/March 1993), pp. 55~75.

註⑪ 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頁139。

不同層次的語言使用策略來達成界定社會真實並取得讀者共識。因此，「新聞故事中的字詞選擇與組合並非雕蟲小技，卻是決定辯論情境、議題定義、引發讀者心智再現、與啟動討論的重要利器。」^⑫

新聞框架的概念除了揭示新聞媒體再現真實時是受到新聞組織框架、新聞工作者個人認知框架、新聞文本框架與消息來源共同建構而成，也提供了研究者一個有效的概念工具，足以通過分析新聞文本找出隱藏其中的框架。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後，爲了動員全民投入革命建設，除了建立以黨報一統爲特徵的報業體制，同時還針對各行業、黨派、群體成立各種類型報紙，例如行業報、對象報等，使得大陸報業肩負了黨政機關的宣傳喉舌、傳達行業政策信息，以及動員灌輸群眾的輿論工具^⑬。爲了達成這些任務，大陸傳媒在長年的輿論宣傳中，形成相當獨特的新聞文本框架。

近年來，研究中國傳媒學界已有數篇論文探討大陸報業在報導特定新聞時採用何種新聞框架，或者描述中國傳媒獨特的話語結構與報導方式。

李豔紅在「政治新聞的模糊表述：從中國大陸兩家報紙對克林頓訪華的報導看市場化的影響」，選擇一家市場化報紙**環球時報**與仍然受到黨國嚴格控制、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比較兩報在報導「克林頓訪華」這種既屬於國際政治新聞、也可以劃入官方活動的新聞時，究竟採用何種新聞框架^⑭？

李豔紅的文章結論指出，**人民日報**的報導採用了三種基本框架，分別是「美好中國」框架、「官方權威」框架和「國家立場」框架。這三種框架幾乎壟斷了**人民日報**的所有報導。「美好中國」框架往往將重點放在宣傳和讚美中國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強盛的國力、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地位或其他各方面的積極表現上。在這個框架上，克林頓訪華被講述爲「發現一個美好中國」的故事。「官方權威」框架主要以強調黨、政府和領導人的權威爲目的，體現在對一些儀式性過程，如「歡迎儀式」和「話別儀式」等報導上。這些報導有一個共同方式，就是都詳盡地列出迎接克林頓的中方官員名單以及各自官銜，這也是中國政治新聞報導一種常見的文本方式，通過不斷呈現名字來強化官方人物，進而強化黨／國的權威；「官方權威」框架也常常呈現在其他報導方式上，例如大幅刊登領導人照片等。「國家立場」框架主要以聲明和傳達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的實質立場和政策爲特徵，例如在報導中不斷強調中國在對待台灣問題上的政治立場、強調中國與美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等。這三種框架充分反映了新聞作爲黨／國意識型態和政策宣傳工具的基本特徵，分別對應以下三種文本功能：「美好中國」框架透過強調中國取得成就和積極正面形象，有利於樹立當前政權的合法性；「官方權威」框架直接作用於強化官方權威；「國家立場」框架則直接

註⑫ 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頁143。

註⑬ 張裕亮，「從黨國化到集團化—大陸報業結構變革分析」，**東亞研究**，第36卷第1期（2005年1月），頁52。

註⑭ 李豔紅，「政治新聞的模糊表述：從中國大陸兩家報紙對克林頓訪華的報導看市場化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75期（2003年4月），頁169～171。

為政策宣傳，成為黨和國家向其社會成員宣傳國家立場的傳聲筒^⑤。

李豔紅也指出，財政結構的市場化使得**環球時報**在實際運作中表現出充分的市場意識，在內容採編上必須考慮經濟面，自然以追求吸引讀者人數為主要訴求。在此種情形下，**環球時報**弱化了**人民日報**佔壟斷性地位三種框架履行的文本功能：淡化了官方權威、減弱了媒體宣揚現存政權合法性和宣傳國家政策的職能；取而代之的是兩種新的框架：「人情趣味」框架和「真實中國」框架。「人情趣味」框架是指報導焦點往往放在一些個人的、軼事的和日常生活細節等方面，報導關心的是普通人的興趣，通常與政治沒有什麼關聯。在這些細節的描述裡，讀者窺探到的是以往人們在官方媒介中無法了解到的大國元首生活細節以及外交禮儀之外的生活安排。「真實中國」框架的報導是立足於糾正在美國社會佔有一定比例的「反華」觀點，例如認為中國是「威脅」、中國封閉落後以及仍然停留在原來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等方面的看法，它試圖通過克林頓的中國之旅向全世界告知中國的真實情況。「真實中國」框架力求呈現出一種更加客觀和中立的面貌，在語言上往往更為中立和非情感化。同時，在**環球時報**報導中，對抗性框架並沒有出現，例如在西方媒體的中國新聞中經常出現的「冷戰意識型態」框架或「民主、自由、人權」框架^⑥。

趙月枝 (Yuezhi Zhao) 在「進入世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強國夢與大陸報業有關入世的論述分析」一文中，選擇三份黨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四份對象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農民報**、**中國婦女報**，五份市民報：**北京青年報**、**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證券報**、**中國經營報**、**南方周末**，分析隱藏在三類大陸報紙中的中國官方框架為何？同時，比較這三類報紙在處理中美入世最後一輪雙邊談判報導，採用何種新聞框架？趙月枝指出，對於中國入世後的經濟效應，隱藏在三類大陸報紙中的中國官方框架是：機遇與挑戰並存，但是機遇大於挑戰。大體上，主要報導主題都集中在中國將接受全球化市場規則的制約，同時隱含著中國面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框架。**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的標題就標明：「進入世界：適者生存的動力與威脅」，強調中國需要透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引進市場的既定規則^⑦。

由於黨報、對象報與市民報都不能挑戰中國官方定下的「新自由主義」框架，再加上中國官方禁止報紙主張全盤私有化與自由民主的論點，市民報的報導於是改由市場經濟角度切入，將入世與民衆日常生活聯繫起來，採取「都市消費者」框架，**北京青年報**更建立讀者熱線回答市民有關入世詢問。當中國官方還援引「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抽象概念而沒有任何闡釋時，市民報以及對象報在其影響分析中，已開始使用「老百姓」、「我們」、「國人」的詞彙。**中國經濟時報**就將「我們」視為「中

註⑤ 李豔紅，「政治新聞的模糊表述：從中國大陸兩家報紙對克林頓訪華的報導看市場化的影響」，頁177~179。

註⑥ 李豔紅，「政治新聞的模糊表述：從中國大陸兩家報紙對克林頓訪華的報導看市場化的影響」，頁179~181。

註⑦ 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p. 32~39.

國老百姓」，其中包括了投資者、股民等。北京青年報則在回覆讀者詢問入世後對「老百姓」帶來的利益時，描述了未來消費者天堂的景像。連中國婦女報也加入市民報行列，慶賀專業者、股民的新機會以及消費天堂的來臨。市民報此種高度一致以「都市消費者」取向的報導框架，並非是由黨的宣傳部門制定並且下發到各媒體，主要是考量到爭取自費讀者市場。此種「都市消費者」報導框架同樣可以在黨報中發現，人民日報就報導，入世最終的受惠者無疑是消費者，他們將得到高品質、低價格的產品與服務¹⁸。

至於大陸傳媒獨特的話語結構，由於中共意識形態的排他性，大陸傳媒使用的語言是以官話為代表的話語結構，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暴力語言、氣體語言和密碼語言。其中，暴力語言集中體現了中共意識形態的權力與霸氣，充滿著仇恨情緒和火藥味，以其攻擊性、醜化性、侵略性居高臨下審判一切。暴力語言在報紙的社論、評論批評論文章中尤為多見，特別是在大批判為主的政治運動中，更成為媒體的主要話語。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對學生運動定性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挑起的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能。」¹⁹

表現在大陸媒體中官話的第二種形式是氣體語言，或稱為「套話」。如果說暴力語言會隨著政治運動的擺動時強時弱，氣體語言則始終平穩地覆蓋著所有媒介，受到黨的意識形態所推崇，並經常使用一些抽象名詞和政治術語的組合。例如，人民日報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二日第一版的一條新華社電訊稿的結尾：「在當代中國，愛祖國就是要熱愛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進行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的教育，使廣大青少年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宇宙觀、人生觀，保證我們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勝利屬於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人們。」從這則新聞中，可以看出氣體語言的基本特徵是高度抽象化、概念化。表現在大陸媒體中官話的第三種形式，是深藏玄機的密碼語言。由於大陸傳媒與中央政治關係密切，使得傳播媒體報導新聞時往往透露中共黨內內鬥的玄機。例如舉行重大政治活動，中共領導人姓名在報紙上排列的順序，以及在報紙版面的位置、篇幅大小，均反映當事人在政治上的寵辱²⁰。

如同前述新聞媒體再現真實時涉及三個框架內涵，包括組織框架、新聞工作者個人認知框架，以及文本框架。然而就符號真實的再現過程觀之，新聞媒體並非轉換真實的唯一社會機制。英國文化學者S. Hall在一九七〇年代即已提出「消息來源是社會

註¹⁸ 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pp. 39~41.

註¹⁹ 曹長青，「語言暴力：極權統治的威懾力量—大陸報業角色分析之四」，中國之春（紐約），第1期（1992年1月），頁46~50；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135~147。

註²⁰ 曹長青，「語言暴力：極權統治的威懾力量—大陸報業角色分析之四」，頁135~147。

真實的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s）」概念，指稱新聞媒體其實無力單獨產製新聞，多半受到消息來源的「引入（cue in）」始能注意到特殊話題。易言之，Hall強調消息來源才是社會事件的第一手建構者，新聞工作者僅堪稱為「次級界定者」，其任務不過是根據消息來源之暗示，將社會現有階層與權力關係再製成符碼罷了^②。

國內框架理論學者臧國仁綜合多家學派觀點，將消息來源視為社會行動競爭者，彼此競相在媒介論域中爭取言說論述的主控權。這些競爭者各自透過組織文化動員資源與人力，建構符合組織框架的言說內容，並試圖接近媒介，以爭取其接納論點，成為新聞框架的核心與基本立場，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建構社會主流思潮^③。

趙月枝在「進入世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強國夢與大陸報業有關入世的論述分析」一文中，也探討黨報、對象報與市民報這三類報紙中誰是消息來源主角？該文將消息來源分成六類：中國官員、外國官員、跨國公司發言人、中國企業領導、中國專家學者、其他。由於這是中美兩國間簽署入世協定，消息來源上理應是中國官員與外國官員為主，但是中國官方的論述沒有超過江澤民的「雙贏」論調等，絕大多數是保持沈默，不願意透露協定具體內容。此種沈默使得缺乏第一手訊息的各個經濟部門首長，不敢隨意評論協定內容。反倒是外國官員與跨國公司發言人成為主要消息來源，北京青年報佔了43.2%，中國經營報佔了30.6%，人民日報更高居87.5%。北京青年報與中國經營報也相當倚重來自中國企業領導、專家的訊息，分別佔了47.2%、67.4%^④。

文中也指出，在傳統大陸黨報報導中，專家學者一向不是作為消息來源重要角色，但是隨著都市白領階層的興起以及國家對專家在執行現代化計劃的日益倚重，使其在大陸報業中也佔據另一種重要角色。雖然大多數專家學者是以理性、全面的論述表達，使得國家與其政策更加合法化，但是對於市民報來說，專家學者的消息來源可以增加報紙的信賴、權威，甚至是代表一些獨立的聲音。兩家市民報－北京青年報、中國經營報在消息來源上引用中國專家學者比例，分別為20.8%、24.5%。相當諷刺的是，中國入世後對工人、農民將造成巨大衝擊，但是研究顯示包括黨報、市民報，甚至對象報報導裡，工人、農民都沒有成為消息來源。在黨報與市民報裡並沒有任何一則新聞報導入世後對中國工人、農民造成的影響，也沒有一位工人或者農民接受採訪^⑤。

註^② S. Hall et al.,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News: Mugging in the Media," in S. Cohen and J.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1), pp. 340~341.

註^③ 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頁156~166。

註^④ 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pp. 41~47.

註^⑤ 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pp. 42~47.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選擇京華時報作為觀察黨政會議新聞的市民消費表述的樣本，主要是基於以下考量：1. 該報是於二〇〇一年由人民日報主辦、上市公司北大青島文化集團出資五千萬元創刊。該報創刊時就明確定位報紙的屬性，強調地域化、市民化、市場化與綜合性。地域化指的是不走全國性發行道路，集中在北京發行，充分體現新聞的鄰近性；市民化要求盡可能爭取廣大市民讀者，目標是文化程度高、收入較穩定的中、青年市民；市場化強調主打零售市場、家庭市場，力爭每一份報紙都是讀者自費購買，以確保其有效發行；綜合性力爭全方位提供市民關心的各類新聞、市民最需要的豐富資訊、市民最欣賞的體育娛樂信息^⑤。

2. 京華時報在欄目設計上，三十二個版中除去四個廣告整版外，開闢財經版四塊、證券版四塊、娛樂和體育版六塊，這十四個大版顯然是面向讀者群人數最多，也是最有價值的讀者群：金融行業、商業和市場銷售人員和學生。該報並試圖將北京市民一網打盡，因此在欄目設計上還包括國內時事動態、社會熱點、國際事件等，不僅滿足不同讀者需求，更貼近百姓生活^⑥。京華時報創刊首日，就組織兩千多人的流動售報隊伍，建立涵蓋北京市八區的三十六個發行站，首日便創下三十萬份發行量^⑦。該報運用此種「水銀式發行」快速提高市場佔有率，接著採取逆向發行策略，壓低發行量，然後運用廣告收入彌補。創刊隔年底，廣告收入就從創刊時的四百五十萬元激增到四千五百萬元，二〇〇四年前半年廣告額更達到三億一千五百一十六萬元^⑧。

從京華時報創刊時的自我定位與欄目設計觀之，黨政會議新聞絕非是其報導賣點，但是在面對「兩會」這種例行重大黨政會議，為了同時向黨中央公開表態、善盡宣傳喉舌任務，以及兼顧市民讀者權益，於是發展出一套市民消費表述的新聞處理方式。京華時報的因應之道，正足以作為大陸目前市民報的效法範本。

本文同時選擇人民日報作為比較樣本，除了考量該報是京華時報母報外，也基於以下理由：人民日報長期來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共中央輿論宣傳主要喉舌，曾擁有高達六百萬份的發行量，二〇〇四年則下滑到一百七十二萬份，但仍排名大陸報

註⑤ 「寫在京華時報創刊一週年之際」，新聞戰線，2002年6月，<http://www.snweb.com/gb/xw/2002/06/a0601016.htm>。

註⑥ 「探析京華時報快速成功之道」，中國營銷傳播網，2003年1月10日，<http://www.emkt.com.cn/>。

註⑦ 「從南方都市报和京華時報的發行策略看發行在報業發展中的作用」，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4年5月20日，<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6450>。

註⑧ 「2001年北京六大平面媒體廣告監測報告」，慧聰網，<http://www.media.hc360.com/media.htm>；「中國最具廣告價值的報紙期刊25強」，聰慧網，2004年11月16日，<http://info.ad.hc360.com/html/001/006/011/21420.htm>。

紙發行量第二名，可說是中國共產黨發號司令的輿論中心。部分中共基層黨員甚至將人民日報稱作「白頭文件」，強調從閱讀該報中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規章。該報社論直接承擔著宣傳中共意識形態理論，解釋中共黨的方針和政策責任，對下級黨報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²⁹。

相較於近年來大陸報業商業化對黨報輿論宣傳角色的鬆動，人民日報堪稱是大陸黨報政治喉舌的最後堡壘，在處理重大黨政會議新聞時仍然必須謹守喉舌任務，但是面對京華時報以市民消費表述方式報導，該報也有所因應。

(二) 類目建構、分析單位與信度檢驗

從上述文獻回顧可以得知，在報導「克林頓訪華」這種國際政治新聞時，環球時報淡化了人民日報使用的新聞框架，改採兩種新的框架：「人情趣味」框架與「真實中國」框架，亦即放棄人民日報一貫從黨國官方角度出發、扮演黨國意識型態和政策宣傳工具的角色，改以市民報強調的讀者興趣導向，以爭取吸引讀者人數為主要訴求。值得注意的是，環球時報並未發展出對抗性框架，例如使用迄今仍被中國官方視為報導禁忌的「民主、自由、人權」框架。

其次，在報導中美入世談判報導中，代表中國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定下「新自由主義」框架後，市民報與對象報對此都不敢逾越。但是，對於必須在營運上自負盈虧的市民報來說，為了爭取廣泛讀者，於是改採「都市消費者」框架，詳細報導大陸入世後對消費者帶來的福利，描述未來消費者天堂的美景。

同樣的，針對大陸每年例行上演的「兩會」重大黨政會議新聞，新興的市民報如何避免長期來作為報導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和活動、宣傳黨國政策文件、向黨中央交心表態的「官式」報導型態，同時如何從冗長的黨政會議報導中，刊載市民關心的實用性、消費性新聞，以爭取廣泛自費讀者，可說是刻不容緩。

大體上，內容分析的類目形成主要分成兩種形式：依據理論或過去研究成果發展而成；或者由研究者自行發展而成³⁰。基於本文研究目的是試圖了解京華時報報導「兩會」此種重大黨政會議新聞時，是否已出現市民消費表述的處理方式？同時，比較京華時報與其母報－人民日報處理「兩會」報導時的差異，藉此驗證報業商業化後對黨報處理黨政會議新聞造成何種影響？

為此，本文將黨政會議新聞的市民消費表述定義為：在報導框架上，以傳達訊息為主，捨棄黨報一貫從黨國立場出發的宣傳框架；在報導方式上，較多採用純淨新聞、深度新聞報導、解釋性新聞報導、調查性報導、網路互動報導，捨棄黨報常用的評論、時評、摘編；在消息來源上，市民、讀者、網民、專家學者雖然尚未成為行動主角，但是已經開始展現聲音。

準此，本研究建構了四個類目。其中，屬於說什麼（What is said）的實質類目

註²⁹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69～78。

註³⁰ 楊孝潔，傳播研究方法總論（台北：三民書局，1978年），頁204。

包括報導框架、消息來源類目；屬於如何說（How it is said）的形式類目包括報導方式^①。同時，筆者選擇二〇〇四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亦即從三月四日至十五日的兩報「兩會」報導作為內容分析樣本。

1. 報導框架

在報導框架上，本文建構了五個類目：凝聚團結、誇耀成就、宣示政策、建言表態、傳達訊息。本文試圖從這五種報導框架，分析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如何選用（或排除）與重組某些語言結構與字詞選擇，一方面再現「兩會」真實，一方面傳遞「兩會」隱含的深層政治意涵與儀式意義。

2. 報導方式

大陸傳媒在長期的宣傳中相當重視發揮不同體裁的功用，常用的體裁包括消息、通訊與評論。評論可說是大陸傳媒的旗幟，媒體往往通過評論，態度鮮明地表明對新聞事件的立場，藉此宣傳中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評論的主要形式包括社論、評論、評論員文章、短評、時評、編者按、編後語等。消息是大陸傳媒新聞報導的主體，以溝通信息為主要任務。消息一般配置醒目標題，具有「本報訊」或「電頭」，結構上往往頭重腳輕，採用倒金字塔式，亦即按照重要性遞減的順序安排事實^②。消息基本上類似西方報業的純淨新聞。

通訊主要是運用敘述、描寫和議論等多種手法，詳細地報導一些重大事件或典型人物。大陸傳媒的「大通訊」類似於西方新聞界流行的「特寫」，但容量往往要比這些特寫大得多，有時候一個整版都無法容納。根據中共新聞理論的規範，大通訊表現的人物有二種特色：他們都是某個行業的先進人物和模範；他們同時是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最有力的體現者。這種大通訊一經媒體刊登或播發，中共宣傳部門立即組織宣傳攻勢來推動學習英雄榜樣人物^③。

除了消息、通訊與評論這三種常用報導體裁外，近年來大陸報業已逐步採用西方報業慣用的報導方式，例如深度新聞報導、解釋性新聞報導、調查性報導、專訪等，京華時報在「兩會」報導時甚至獨創一格，採用所謂網路互動報導。

3. 消息來源

如同前述，框架理論學者將消息來源視為社會行動競爭者，彼此競相在媒介論域中爭取言說論述的主控權。為此，本文將消息來源分為七個類目：記者觀察、新華社、兩會代表、黨政人士、專家學者、市民讀者與網民、其他媒體。

記者觀察：以報社記者為第一人稱，作為整篇報導的消息來源。新華社：作為中共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代表政府授權發佈重大國內新聞和外事新聞，並就國內外重大

註① 王石番，*傳播內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獅書局，1996年），頁229～230。

註② 胡瑞寧，*新聞寫作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頁77。

註③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149～152。

事件代表中共及政府表態，是國家集中統一的新聞發佈機構；新華社發佈的通稿是大陸各級媒體在報導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時必須採用的指標性稿件^④。兩會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與全國人大代表。黨政人士：具備正式黨職與政府官員身分者。專家學者：在消息來源中署名教授、院士、研究員等頭銜人士。市民、讀者或網民：民衆接受採訪、或者透過網路對談、讀者投書表達意見。其它媒體：新聞來自外國通訊社或其他媒體。

在內容分析單位上，可依據不同功能分成三種：抽樣單位（sampling units）、紀錄單位（recording units）與脈絡單位（context units）。其中紀錄單位是內容分析的最基本單位，主要是蒐集抽樣單位中的資料，提供作為分析的基礎。紀錄單位包括六種形式：單字或符號（single word or symbol）、語幹（theme）、人物（character）、句子或段落（sentence or paragraph）、則數（item）、時空單位（space and time measures）^⑤。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採用則數為紀錄單位，每一則刊載的新聞報導即為一次。在統計方法上，係採用 SPSS 電腦程式處理，以則數分配或百分比解釋。

本研究在信度檢驗上是由筆者與二位編碼員，在討論各項類目操作定義後進行。依據 Wimmer and Dominick 指出^⑥，信度檢驗必須抽取樣本 10% 至 25% 來進行抽樣分析，為此本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研究總數的 20% 作為前測樣本。首先求得兩位編碼員相互同意度，再計算三位編碼員的信度。大體上，信度一般在 0.8 以上即符合標準^⑦，本研究信度檢驗為 0.92，合乎信度要求。

四、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角色與功能

按照中共一九八二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時也是具體體現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性質的政權組織形式^⑧。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其他的國家機關包括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最高司法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軍事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都是由全國人大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主要職權包括修改憲法；制定法律；監督憲法的實施；選舉及決定國家主席及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國務院組成人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

註④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 60~61；曹玉玲，「中共組織簡介－新華通訊社」，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期（1997 年 7 月），頁 89~98。

註⑤ 王石番，傳播內分析法－理論與實證，頁 229~233。

註⑥ R. D. Wimmer and J. R. Dominick 著，李天任、藍莘譯，大眾媒體研究（台北：亞太出版社，1995 年），頁 240。

註⑦ 王石番，傳播內分析法－理論與實證，頁 311。

註⑧ 松花穆林編，中國憲法學（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64~65。

高人民檢察長、全國人代會常委會成員，並且依憲法罷免之；決定國民經濟計劃；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決算等事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產生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軍隊和華僑選出的代表組成，按照不同的地區、民族、行業及特殊需要，根據實際人口分佈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規定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每屆五年^③。

根據中共一九八二憲法規定，除了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之外，凡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共領導人爲此認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廣泛的代表性；同時人民代表大會在制定法律、通過決議時，既能充分體現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又能適當照顧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各地區、各黨派的特殊利益和要求^④。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一九八二憲法規定，人民代表的選舉僅限於縣級及其以下，縣以上包括省與全國人大則屬於間接選舉，使得中共有相當大的運用空間。中共在一九八六年公佈修正通過的選舉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時，由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將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和代表提出的代表候選人名單，提交全體人民代表反覆醞釀、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代表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除了間接選舉的規定外，候選人的提名也給予中共控制的機會。依照中共選舉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代表候選人不限於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意謂著，中共可以徵召其屬意的人選出任上一級人大代表候選人，將其不屬意的代表擠掉^⑤。

簡言之，從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到議案的審查，賦予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由於各級人大代表中絕大多數爲中國共產黨員，使得人大代表的選舉成爲對共產黨的信任投票，間接賦予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同時也否定向共黨政權挑戰的政治力量^⑥。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政權後，一直到一九五四年頒佈憲法選舉產生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政協）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制定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政協組織法》，更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任命政府官員，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得以順利組成。全國政協代行人大職權的功能結束後，其地位與職能也發生根本的變化，從原本臨時國會機構變成一個純粹的統戰性組織。中共仍保留其作爲「建議機關」，當時的作用只有聯誼、諮詢建議、改造教育等，文革期間甚至一度停止辦公，

註^③ 朱新民，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台北：永然出版社，1991年），頁110~115。

註^④ 松花穆林編，中國憲法學，頁67。

註^⑤ 丁樹範，「人民代表大會的改革」，吳安家編，中共政治發展（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4年），頁145~146。

註^⑥ 鄭宇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加強」，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50~154。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後，政協才又再度活躍起來^③。

改革開放後，政協再度活躍受到重視有內外兩項原因。內部因素是指中國大陸因應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與科技文明，自然需要一批學有專精的知識份子提供意見諮詢。爲了掌控這些知識份子，政協擴大了原有的統戰聯誼功能，強調新的諮詢建言作用。政府得就重大事宜向政協徵求意見，政協也可以透過「建議案」建言獻策、提出興革意見，這樣的作用讓政協帶有「準議會」性質。在外部因素方面，爲了防範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出現的蘇聯解體與東歐共黨變革對一黨專制體制的衝擊，中共被迫加強所謂「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制度，這種制度的具體實踐就是政協的組織形式^④。

大體上，目前政協的定位如下：1.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戰組織：中共中央是由統戰部指揮政協的工作方向及人事安排，政協遇有重大需要，也可請求統戰部門給予支援協助。爲了兩者聯繫上更具效率，也爲了指揮迅速考量，統戰部門重要領導人多擔任政協高層職務。早期負責推動政協日常事務總樞紐的政協祕書長一職，多由中共統戰部部長或副部長擔任，近期則爲明確區分黨政人事，政協機關的職務改由政協內部人員升任，但統戰部部長多擔任政協副主席，且因身份特殊，爲求統籌協調方便，往往成爲衆多副主席中最具實權的政協副主席^⑤。

2. 代表各方利益結合的特殊政治團體：基本上，政協的組成單位是以黨派、團體、職業代表劃爲不同的界別。舉例來說，十屆全國政協會議共有三十四個界別，分別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盟、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文化藝術界、科學技術界、社會科學界、經濟界、農業界、教育界、體育界、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對外友好界、社會福利界、少數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門人士、特別邀請人士等單位。每一個界別又根據其重要性及代表性，有不同的代表名額。基本上，政協委員產生的方式是由各政黨、團體、職業代表的協商、推選或特別邀請的代表人士所組成^⑥。

這些參加政協的單位（界別）都是作爲中共意圖拉攏的某一類特殊社會階層組織，他們被集合在政協之下，透過政協來與中共或大陸社會接觸。由於政協的組織法及章程均有載明對不同意見的特別處理方式，即各界對政協通過的決議只可以「保留不同意見待下次會議討論，但不得違反；如對重要決議根本不同意時只能申請退出政協」，這使得「政協」裡很難聽到「異議」^⑦。對中共官方來說，存在政協這種組織正足以

註③ 李孔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位變遷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73~74、213~214。

註④ 李孔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位變遷之探討」，頁215~216。

註⑤ 李孔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位變遷之探討」，頁122~125。

註⑥ 共黨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頁49。

註⑦ 李孔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位變遷之探討」，頁125~127、218。

誇稱包納大陸內部社會的多元性，足以滿足各個界別對利益的需求，不過在制度設計上封殺各個界別的「異議」，使得政協成爲各界別與政府間的緩衝閥，以及鞏固中共對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領導的合法性。

依照一九七九年通過，並經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兩次修訂的選舉法規定，全國人大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解放軍選出的代表組成，總額不超過三千人^④。至於全國政協則大約有兩千名^⑤。這些爲數衆多的全國人大代表與全國政協除了應有的職權外，由於當選後仍不脫離原生產、工作崗位，因此在每年三月例行召開的「兩會」結束後，返回原來工作單位，就可達到「吹風」的效果，傳達黨和國家最新的工作指示和精神。

由於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是分別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與代表各方利益結合的特殊團體，同時在人員產生的設計已經排除了「異議者」出線的可能性，這使得中共官方可以藉由每年三月例行召開的「兩會」，一方面匯聚來自全國各界的「民意」，一方面委由近五千名出席委員、代表在會後傳達黨國政策與指示，並藉此合法化中共統治的正當性。

五、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報導方式的異同

「兩會」既然扮演了中共政權合法化的重要功能，因此對大陸黨報來說，如何正確報導「兩會」黨政會議新聞就成爲一項高度政治性的新聞處理工作，從版面的安排、內文標題撰寫到編採人員的組成，都有其縝密嚴謹的「制式」作業流程。在長期處理過程中，大陸黨報發展出一些從黨國立場出發的宣傳框架，例如「凝聚團結」框架、「誇耀成就」框架、「宣示政策」框架、「建言表態」框架。不過，隨著近年來以市民讀者消費取向的市民報異軍突起後，在處理「兩會」報導時如何同時兼顧黨國宣傳立場與市民讀者權益，可說是大陸黨報必須面對的課題，因此採用「傳達訊息」框架已經日益普遍。

(一) 報導框架

從(表一)可以得知，人民日報採用的報導框架，依序爲「建言表態」383則(50.7%)、「誇耀成就」173則(22.9%)、「凝聚團結」80則(10.6%)、「傳達訊息」71則(9.4%)、「宣示政策」48則(6.4%)。大體上，人民日報採用的報導框架還是一貫從黨國立場出發的官方宣傳框架，並從中合理化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凝聚團結」框架將「兩會」的召開，營造成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團結勝利大會；強調凝聚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對黨國建設的信心、出自內心的激動、精神

註④ 一九七九年通過的選舉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總額不超過3,500人，直到一九八六年修訂後，才規定爲不超過3,000人。參見浦興祖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3；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3月6日，第1版。

註⑤ 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3月4日，第1版。

上的奮發抖擻；以及市井百姓對黨國施政求真務實的感激。「凝聚團結」框架同時也再現「兩會」振奮、燦爛的場景。

表一 報導框架與報別交叉表

類 目	人民日報		京華時報		總和
	則	百分比%	則	百分比%	
1 凝聚團結	80	10.6	47	11.5	127
2 誇耀成就	173	22.9	20	4.9	193
3 宣示政策	48	6.4	2	0.5	50
4 建言表態	383	50.7	26	6.4	409
5 傳達訊息	71	9.4	313	76.7	384
總 計	755	100.0	408	100.0	1163

全國人大二〇〇四年三月五日開幕時，人民日報報導「近 3000 名全國人大代表，肩負全國各族人民的重托，出席今天的盛會。在為期 10 天的會議期間，他們將認真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聽取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審議憲法修正案草案，聽取和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等。」^①同樣的，全國政協會議三月十二日閉幕時，人民日報分別以「會議號召，人民政協的各級組織、各參加單位和政協委員，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切實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②

「凝聚團結」框架也強調了出席委員內心的激動。人民日報三月十五日報導：「14 時剛過，來自全國各地的近 3000 名人大代表，胸戴鮮紅代表證，精神飽滿，步履從容，陸續來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台階上，東大廳茶桌旁，代表們握手相擁，心潮澎湃。多次參加黨代會、人代會的李桂蓮代表說：『這是一次民主團結的大會，站在新起點，面對新機遇、新挑戰，代表們暢所欲言、坦陳直言，理清了思路，明確了方向。』河北省副省長郭庚茂代表說：『這是一次求實鼓勁的大會，肯定成績實事求是，分析問題客觀深刻，謀求發展科學積極，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氣。』」^③

「凝聚團結」框架同時描述面對酷寒，出席委員仍然精神抖擻。三月五日北京刮起了四到五級偏北風，氣溫已經降到了攝氏零下 2 度。人民日報隔日報導：「『天氣雖冷，但是我們心潮澎湃』，來自湖南的樂壽長委員興奮地對記者說：『去年我們祖國遇到的困難比往年大，取得的成就卻比往年多，我們來參會的委員們都是精神抖擻。』」^④有些代表則是聽聞國家新政策感動落淚：「『5 年內取消農業稅，為這句話

註①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6 日，第 1 版。

註②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

註③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15 日，第 4 版。

註④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4 日，第 8 版。

我流了淚。」參加完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式，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秦皇島市北戴河區草廠村村民郭文香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⑤④}

「凝聚團結」框架除了再現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對黨國建設的堅定信念外，**人民日報**也捕捉到街頭百姓對「兩會」召開的興奮與感激。「北京百姓對今年的『兩會』充滿信心。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社區居民祝寶文說：「大家都滿懷信心迎接『兩會』的召開。前幾天北京新當選市長的發言對我們鼓舞很大，特別是廉政建設、就業問題都講得很實在。我們也希望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求真務實，多解決老百姓關心的實際問題。」^{⑤⑤}

「凝聚團結」框架同時再現「兩會」振奮、燦爛的場景。**人民日報**三月四日報導：「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內，燈火輝煌，象徵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政協會徽懸掛在主席台正中，十分鮮艷的紅旗分列兩側，格外顯目。」^{⑤⑥}三月十二日全國政協閉幕時，**人民日報**隔日也報導：「12日下午，長安街上嫩黃的迎春花和盛開的玉蘭花展示著春天的活力，天安門廣場四周紅旗高高飄揚。就在天安門廣場的北側，不少群眾在那裡駐足眺望，即將閉幕的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成為大家聚焦的內容。」^{⑤⑦}

對每年例行出席「兩會」的各界別政協委員、各地區人大代表來說，如何掌握這種難得的政治盛會，向黨國誇耀個別取得成就可說相當重要，「誇耀成就」框架自然成為**人民日報**報導「兩會」時俯拾可得的報導題材。**人民日報**報導：「全國人大代表、陝西安康市委書記黃瑋說，去年安康堅持『打綠色牌、走生態路』，關閉了流域內所有污染的礦產企業，實行退耕還林 50 多萬畝，全市森林覆蓋率超過了 50%，減少了水土流失。」^{⑤⑧}

「誇耀成就」框架同時也成為政協、人大自身誇耀取得工作成績的舞台。例如，「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以來，政協委員、政協的各參加單位和政協專門委員會，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積極建言獻策，共提交提案 3819 件，經審查，立案 3576 件。截至目前，98.8% 已經辦復。」^{⑤⑨}

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其他的國家機關包括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最高司法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軍事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都是由全國人大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因此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務院部會首長等黨政人士依法必須出席「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在此種情形下，**人民日報**也採用「宣示政策」框架，描述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務院部會首長藉由「兩會」召開場合，宣佈國家相關政策的報導。

人民日報報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5 日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

註⑤④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6 日，第 1 版。

註⑤⑤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4 日，第 4 版。

註⑤⑥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4 日，第 1 版。

註⑤⑦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註⑤⑧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5 日，第 6 版。

註⑤⑨ **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 3 月 4 日，第 2 版。

報告時說，二〇〇四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抓好發展這個第一要務。」^⑩

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的角色既然是作為匯聚各階層、各民族、各地區、各黨派，以及各團體、職業代表利益的場域，「建言獻策」自然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最基本的職責，不過由於制度上的設計封殺了「兩會」出現「異議」的空間，使得「建言獻策」轉而成爲「建言表態」。簡言之，「建言表態」框架掌握了出席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在「兩會」的建言方式，一方面向黨國交心表態、表達忠誠、自我標榜取得成績，一方面同時坦承工作中仍然存在諸多困難尙待努力。

出席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白克明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說：「結合河北實際，去年河北省的 GDP 突破了 7000 億元大關，同比增長 11.6%，各項主要經濟指標達到了近年來最好水平。可以說，我們實現了『加快發展』的目標。」白克明話鋒一轉：「但是必須看到，我們離『更快發展』的要求還有距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還十分艱巨。目前，全省還有 200 多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產業結構仍不盡合理，各地區之間發展還不協調。所有這些，都迫切要求我們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⑪

「建言表態」框架有時也隱含出席委員、代表以國家大局爲重，自我奉獻與甘當配角的決心。人民日報報導：「談及區域統籌協調發展，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代表認爲：『結合自身特點，江西要甘當配角，錯位發展。』他說，論資金、技術，我們比不上發達地區，但我們有豐富的原料資源、廉價的勞力資源、廣闊的市場資源、優美的生態資源。在區域合作中，我們要有甘當配角的勇氣，爲發達地區提供原料、勞力和市場，爲他們提供生態屏障，提供休閒條件，在當好配角的過程中謀求發展。」^⑫

大體上，人民日報大量採用了從黨國立場出發的官方宣傳框架，但是面臨報業商業化的衝擊，也開始引進「傳達訊息」框架，佔了 71 則（9.4%）。對自我定位於市民報的京華時報來說，爲了回應市場的需要，「傳達訊息」框架更一躍成爲主導框架。

從（表一）可以得知，人民日報採用的主要報導框架，例如「建言表態」（50.7%）、「誇耀成就」（22.9%）、「凝聚團結」（10.6%）。但在京華時報報導中並沒有成爲主導框架，反而被邊緣化。京華時報的報導框架弱化了人民日報大量出現的出席委員、代表對黨國建設建言的交心表態、自我標榜取得的政績，以及對黨國建設的信心、出自內心的激動、精神上的奮發抖擻。

京華時報取而代之以「傳達訊息」框架報導新聞。「傳達訊息」框架試圖捨棄大陸黨報長期來一貫從黨國立場出發的宣傳框架，改採市民消費者角度出發，如實報導市民關心的實用性、消費性、即時性新聞。從（表一）可以得知，京華時報報導使用

註^⑩ 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3月6日，第2版。

註^⑪ 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3月10日，第8版。

註^⑫ 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3月11日，第6版。

「傳達訊息」框架者達313則（76.7%），其次依序為「凝聚團結」47則（11.5%）、「建言表態」26則（6.4%）、「誇耀成就」20則（4.9%）、「宣示政策」2則（0.5%）。

京華時報使用「傳達訊息」框架，從冗長乏味、空洞八股的委員、代表發言中，找出與北京市民生活權益內容有關新聞集中報導，拉近與北京市民讀者的鄰近性。例如：由於在此次「兩會」上，公共安全問題再度成為代表、委員及公眾關注的熱點之一，國務院目前已著手重大突發事件的統一應急預案體系建設。京華時報意識到北京市在公共安全問題如何進行應對攸關北京市民權益，立即派遣記者從北京市科委方面了解到，一項針對以王府井步行街和西單文化廣場的地下商場為代表的城市開放類和封閉類場所的公共安全評估項目已通過驗收，同時已將禽流感等動物疫情監測納入北京突發事件應急指揮系統^③。

透過「傳達訊息」框架，京華時報讓讀者體會了記者搶新聞的臨場感。京華時報在三月四日政協開幕式報導中，捨棄了人民日報黨報慣例在頭版刊登的巨幅開幕式會場全景與全國政協主席報告照片，取而代之的是在頭版刊登一張多位記者追訪曾在二〇〇三年抗擊「非典」（SARS）貢獻最大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的照片。同時在同日四版中報導，鍾南山與出席全國政協委員一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東門，立刻被數十名守候在此的中外記者圍在當中^④。京華時報記者也迅速捕抓到委員發言及時情形：「昨天上午，在全國政協41組醫衛界委員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當場執筆寫下一份『為政協報告中的非典更名』的緊急提案，要求修改今年政協工作報告中『非典』的提法。下午5時30分，這份由30多位委員鄭重簽名的緊急提案，正式被提交給小組祕書處。」^⑤

「傳達訊息」框架在再現與會代表、委員發言時，很明顯不同於「凝聚團結」框架再現的「信念堅定」、「心情激動」、「交心表態」，取而代之的是代表發言時的「言論交鋒」。京華時報報導：「在分組討論中，經濟界的發言異常火爆，每位委員手中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做了密密麻麻的著重號、雙實線及旁註。爭論最激烈的是今年溫總理所作報告中經濟成長預期目標的變化，委員們普遍認為，政府不崇拜GDP的增長變化，體現了務實的中央精神。」^⑥

迥異於人民日報傳統黨報處理「兩會」新聞時凸顯「重要」官方人物作法，「傳達訊息」框架也捕抓到一位人大代表、同時是「笑星」的甘草人物。京華時報報導，前來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笑星趙本山，身穿一身嶄新的褐色夾克衫，頭戴一頂普通的鴨舌帽，帽沿壓得很低，幾乎快遮住了眼睛。趙本山以這身裝束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東門時，差點從眾記者眼皮底下溜走^⑦。

註③ 京華時報，2004年3月4日，第A6版。

註④ 人民日報（北京），2004年3月4日，第1版；京華時報（北京），2004年3月4日，A4版。

註⑤ 京華時報，2004年3月5日，第A5版。

註⑥ 京華時報，2004年3月6日，第A3版。

註⑦ 京華時報，2004年3月6日，第A3版。

(二) 報導方式

由於「兩會」提供了與會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誇耀成就、建言表態，以及黨政人士宣示政策的場域，面對這些每日成篇累牘的「建言」、「宣示」，大陸黨報長期來都是以「發言摘編」方式處理^{註⑧}。從（表二）可以得知，**人民日報**採用的主要報導方式是摘編，高達 409 則（54.2%）。這是因為**人民日報**作為中共官方主要宣傳喉舌，必須詳盡報導「兩會」代表建言與政府工作報告，由於則數龐大，便以「代表委員建議、心聲」、「分組討論」、「代表發言摘編」、「政府工作報告摘登」等報導型態呈現。同時，摘編的標題經常是冠以「年年關注歲歲情」、「代表委員傳捷報」、「心語快遞」、「代表委員論國是」、「兩會速遞」、「情繫大眾為民謀利吐諍言」、「胸懷全局求真務獻良策」等。

表二 報導方式與報別交叉表

類目	人民日報		京華時報		總和
	則	百分比%	則	百分比%	
1 純淨新聞	217	28.7	223	54.7	440
2 深度新聞報導	0	0.0	13	3.2	13
3 解釋性新聞報導	3	0.4	69	16.9	72
4 調查性報導	0	0.0	6	1.5	6
5 專訪	79	10.5	11	2.6	90
6 評論、社論、時評	47	6.2	2	0.5	49
7 網路互動報導	0	0.0	29	7.1	29
8 摘編、簡訊	409	54.2	55	13.5	464
總計	755	100.0	408	100.0	1163

評論一向是**人民日報**的旗幟，因為這些評論直接承擔著宣傳中共黨的理論、路線以及政府的方針、政策和任務。**人民日報**的社論包括社論、評論員文章、編者按、編者的話、短評等十多種形式，評論的作者包括中共高級領導、專業寫作班子、專業評論作者和業餘評論作者^{註⑨}。從（表二）可以得知，**人民日報**評論（包括社論、時評）總計 47 則（6.2%），相較於**京華時報**僅僅 2 則（0.5%），顯示**人民日報**在報導「兩會」此種例行重大黨政會議新聞時，仍然堅守宣傳喉舌任務。而**京華時報**僅有的兩則評論，都摘編自新華社，說明在刊登高度政治性的評論稿時寧可採用新華社供稿，以

註⑧ 人民日報編輯部，**人民日報版面備要**（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7年），頁19~20。

註⑨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74。

確保政治安全。

當然，因應報業商業化對報導方式的衝擊，為了吸引市民讀者閱讀，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在報導方式上都相當注重純淨新聞，人民日報為217則（28.7%），京華時報則為223則（54.7%）。

京華時報作為新興崛起的市民報，為了因應日益激烈的報業商業化競爭，更引進西方報業經常採用的報導方式，例如解釋性新聞報導、深度新聞報導、調查性報導，分別為69則（16.9%）、13則（3.2%）、6則（1.5%）。相較於人民日報，這三種報導方式則分別為3則（0.4%）、0則、0則，顯得無足輕重。

所謂解釋性新聞報導可以針對一個單字、一個名詞、一個片語、一個事件、一個人物做解釋，也可以針對整個新聞事件內容做闡釋；可以在同一則新聞中解釋，也可以另寫一則新聞加以解釋^⑦。

例如三月十日北京市颳起大風，卻不見漫天黃沙，甚至還能看見藍天。此事引起見過「沙塵暴」的代表委員好奇，也是廣大北京市民相當關心的。京華時報隔日立刻刊載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華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沙塵暴的形成因素已在逐步減少，個別揚沙天氣不會影響北京的藍天工程。同時，該報也採訪國家林業局工作人員，獲悉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初見成效，北京本地形成沙塵暴天氣的可能性不大^⑧。

再如，京華時報於三月六日針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捨棄人民日報逐條摘登方式，以百姓提問方式，由記者分頭採訪北京市相關部門負責人，整理成三十七個議題，以四個冠上「全國兩會解讀」標題版面詳盡報導，讓北京市民了解北京市將採取的相應舉措，充分發揮解釋性新聞報導的功效^⑨。

與解釋性新聞報導比較，深度新聞報導更著重於新聞事件內涵，前者只要分析事件背景，後者還要讓讀者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對民衆具備的意義、可能的影響、應該如何因應等。換言之，它要對一則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做多種不同角度的分析，以呈現它的價值與意涵^⑩。

京華時報頗能根據與會代表發言，考量攸關北京市民關心議題，撰發深度新聞報導。該報在三月七日報導，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昆蟲協會副理事長張鍾寧提交有關「防止外來有害生物入侵立法」議案。張鍾寧告訴記者，傳播蔓延是有害生物威脅生態安全的主要方式，像美國白蛾，傳播地區已到了天津、河北等北京的毗鄰地帶，雖然對人沒有直接影響，但他強烈希望國家制定具體法規、割斷傳播、減少損失。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市保障生態安全的工作已緊張有序地展開^⑪。

這則報導另外還有四則新聞：一則訪問北京市林業局辦公室談應對舉措；一則報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潤志關於「建立國家生物入侵預警機制及加強立法的建議」，

註⑦ 王天濱，台灣地方新聞理論與實務（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頁298。

註⑧ 京華時報，2004年3月11日，第A8版。

註⑨ 京華時報，2004年3月6日，第A5~A8版。

註⑩ 王天濱，台灣地方新聞理論與實務，頁299。

註⑪ 京華時報，2004年3月7日，第A4版。

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一則訪問農業大學動物遺傳專業教授張沅，建議由國務院領導，成立一個獨立、跨部門領域的機構；一則是解釋性新聞報導，解釋美國白蛾。京華時報試圖透過一整版報導，完整呈現美國白蛾已入侵到天津、河北等北京的毗鄰地帶、北京市有關部門相應舉措，以及學者專家建議等^⑥。

所謂調查性報導泛指一切採用訪查方式採得的新聞，強調記者蒐查消息的突出技巧，幾乎接近私家偵探的做法，而新聞主體的本身又能引起廣大閱聽人的矚目與興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對調查報導作過闡述：「爲了研究的目的，應視調查性報導爲發掘新聞內幕的報導，以揭發或引起大眾對某些行爲或情況的注意；而這些行爲或情況，則應係大眾所關心的。調查性報導不限於揭發犯罪或貪污，亦可探討諸如饑餓、環境污染、貧窮等問題，以及緊張的種族情勢等較大的社會問題。」^⑦

從（表二）可清楚看出，調查性報導絕非「兩會」新聞的主流報導方式，不過京華時報掌握難得的機會，在三月十日根據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計劃生育協會常務副會長楊魁孚透露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對擅自使用 B 超鑑定胎兒性別者處以刑責的訊息，派出記者前赴北京市朝陽區一些不具行醫資格的私人診所暗訪，揭露醫師違規爲孕婦鑒定胎兒性別。隔日該報持續追蹤報導，刊載違規醫生「雷大夫」已經受到降級、調離崗位處分。同時，該報也報導這則新聞引起北京市計生委的高度重視：市計生委與市衛生局有關負責人進行了第一次碰頭協商，表示要堅決嚴查違規醫院來杜絕醫院的違法行爲^⑧。

爲了加強與讀者互動，京華時報更獨具匠心，從三月四日起與人民網合作進行全國兩會互動報導。該報每天邀請一位嘉賓就一個主題與讀者和網友進行交流，由編輯刊發部分交流內容。例如，京華時報三月五日報導，「兩會」前夕，在人民網進行的網友關注話題調查中，「加強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這個問題以 32,411 票位列榜首。在這項專題對話裡，網友們「圍」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邵道生和制度反腐專家、中紀委研究室辦公室主任李永忠兩位專家，從反腐敗的各個層面進行了交流^⑨。

除了開闢網路互動專欄加強報社與網民的雙向溝通，京華時報也徵集讀者建議，歡迎讀者在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就當前存在的社會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內容要求簡短、實在^⑩。

（三）消息來源

誠如前述，消息來源是社會行動的競爭者，彼此競相在媒介論域中爭取言說論述的主控權。對於「兩會」此種例行政治盛會，全國人大代表與全國政協委員自然是行

註⑥ 京華時報，2004年3月7日，第A4版。

註⑦ 彭家發，特寫寫作（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144。

註⑧ 京華時報，2004年3月10日，第A6版；2004年3月11日，第A6版。

註⑨ 京華時報，2004年3月5日，第A8版。

註⑩ 京華時報，2004年3月7日，第A5版。

動主角，也理所當然成爲主要消息來源。從（表三）中可以得知，人民日報、京華時報報導的消息來源來自「兩會代表」，分別爲570則（75.5%）、101則（24.8%）。同時，人民日報裡「兩會代表」使用的報導框架絕大多數爲「建言表態」，達到64.6%，其次爲「誇耀成就」，佔18.9%。此種情形進一步佐證「兩會」的召開，提供了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向黨國交心表態與自我標榜政績的場域。

表三 消息來源與報別交叉表

類 目	人民日報		京華時報		總和
	則	%	則	%	
1 記者觀察	16	2.1	61	15.0	77
2 新華社	113	15.0	96	23.5	209
3 兩會代表	570	75.5	101	24.8	671
4 黨政人士	30	4.0	68	16.7	98
5 專家學者	20	2.6	24	5.9	44
6 市民、讀者、網民	5	0.7	51	12.5	56
7 其他媒體	1	0.1	7	1.6	8
總 計	755	100.0	408	100.0	1163

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務院部會首長等黨政人士，依法必須出席「兩會」作工作報告。在此種情形下，黨政人士自然是「兩會」的必要消息來源，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就分別佔了30則（4.0%）、68則（16.7%）。

在大陸新聞系統裡，有一條行之已久的信條，凡在新聞報導中涉及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都必須以新華社的「通稿」爲標準。這種報導上追隨新華社的作法，不僅是因爲其地位特殊是中共最龐大的喉舌，也因爲發表的新聞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中共高層的意見，標誌著輿論宣傳的方向，因爲這些重大新聞的發佈，都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意識形態領導小組或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或指揮的^⑧。

所謂新華社的「通稿」，指的是各級新聞單位都必須採用具有指導性和標準性的稿件。凡新華社發佈的重要消息，全國各主要新聞機構都必須轉發，這種指令從五十年代中共建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⑨。從（表三）可以得知，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引用新華社作爲消息來源仍佔相當比例，各爲113則（15.0%）、96則（23.5%）。這說明大陸報業在報導「兩會」新聞，仍然必須根據事件性質適當採用新華社發佈「通稿」，一方面藉此向黨中央交心表態，一方面反映處理重大黨政會議新聞的政治敏感度，尋求言論尺度上的安全。

註^⑧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108~109。

註^⑨ 「中共中央關於改新華爲統一集中的國家通訊社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1。

學者趙月枝在「進入世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強國夢與大陸報業有關入世的論述分析」一書中指出，在傳統大陸黨報報導中，專家學者一向不是作為消息來源重要角色。但是，隨著都市白領階層的興起以及國家對專家學者在執行現代化計劃的日益倚重，使得專家學者在大陸報業的消息來源中也佔據另一種重要角色。雖然大多數專家學者是以理性、全面的論述表達意見，使得國家與其政策更加合法化，但是對於市民報來說，專家學者的消息來源可以增加報紙的信賴、權威，甚至是代表一些獨立的聲音^{註②}。

此種情形也反映在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上，兩報的消息來源都已注意到如何選用專家學者的意見以強化報紙的權威，比例分別為 20 則（2.6 %）、24 則（5.9 %）。不過，兩報在選用專家學者作為消息來源的報導框架則有所不同。從（表四）可以得知，人民日報的消息來源來自專家學者使用的報導框架，「誇耀成就」者高達 50.0 %、「凝聚團結」者為 20.0 %、「建言表態」者為 15.0 %、「宣示政策」者為 5.0 %，「傳達訊息」者僅佔 10.0 %。這說明人民日報引用專家學者作為消息來源，純粹只是強化、支持該報既有的官方立場，並未展現民間獨立的聲音。而京華時報引述專家學者作為消息來源所使用的報導框架，則完全是「傳達訊息」，說明該報試圖藉由專家學者傳遞不同於官方立場的聲音。

表四 消息來源、報導框架與報別交叉表

消息來源	報導框架									
	人民日報 (%)					京華時報 (%)				
	凝聚團結	誇耀成就	宣示政策	建言表態	傳達訊息	凝聚團結	誇耀成就	宣示政策	建言表態	傳達訊息
1 記者觀察	37.5	25.0	0	12.5	25.0	1.6	8.2	0	0	90.2
2 新華社	17.7	36.3	34.5	5.3	6.2	16.7	5.2	0	0	78.1
3 兩會代表	6.8	18.9	0.3	64.6	9.4	12.9	6.9	0	25.7	54.5
4 黨政人士	20.0	33.3	20.1	13.3	13.3	7.4	4.4	2.9	0	85.3
5 專家學者	20.0	50.0	5.0	15.0	10.0	0	0	0	0	100.0
6 市民、讀者、網民	100.0	0	0	0	0	23.5	0	0	0	76.5
7 其他媒體	0	0	0	0	100.0	0	0	0	5.0	95.0
總計	10.6	22.9	6.4	50.7	9.4	11.5	4.9	0.5	6.4	76.7

以報社記者為第一人稱作為整篇報導的消息來源，已經逐步為京華時報採用，從（表三）可以得知，比例為 61 則（15.0 %）。同時，根據（表四）得知，京華時報

註② 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pp. 42~47.

「記者觀察」的報導框架絕大多數為「傳達訊息」，高達90.2%。從京華時報三月十日派出記者前赴北京市朝陽區一些不具行醫資格的私人診所暗訪，揭露醫師違規為孕婦鑑定胎兒性別一事，以及隔日的持續追蹤報導^⑧，說明該報記者在建構「兩會」新聞時，已逐步能夠在媒介論域中，爭取言說論述的主控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市民、讀者與網民的聲音已逐步在京華時報的消息來源展現。從(表三)可以得知比例為12.5%；同時從(表四)可得知，市民、讀者與網民使用的框架主要是「傳達訊息」，比例為76.5%。京華時報在三月十五日就訪問了十二位包括學生、醫院醫生、商場經理、地鐵值班站長、幼兒園園長等市民，近距離觀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描述其親民愛民的身影，縮短民衆與總理的視野差距^⑨。市民的聲音在「兩會」新聞中一片「兩會代表」的讚揚聲中，顯得相當難能可貴。

六、結 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從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到議案的審查，就賦予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由於各級人大代表中，絕大多數為中國共產黨員，使得人大代表的選舉成為對共產黨的信任投票；再加上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屬於間接選舉，一些敢於發出「異聲」的代表絕對無法當選，否定了向共黨政權挑戰的政治力量。

至於對全國政協會議來說，由於政協提供各個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各界人士等不同單位(界別)「發聲」的合法管道，但是根據政協的組織法及章程規定，各界別對通過的決議只可以「保留不同意見待下次會議討論，但不得違反；如對重要決議根本不同意時只能申請退出政協」，這使得政協裡很難聽到「異議」。

在此種情形下，每年一次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例行自我合法化統治權的重要政治集會。而報導「兩會」此種例行重大黨政會議新聞，自然也就成為大陸黨報重要的宣傳任務。對人民日報來說，為報導好每年的「兩會」新聞，都要組織約五十人的「兩會」報導組，下設編輯組、記者組，由一位副總編輯掛帥，若干位部主任分口負責採訪報導。在版面安排上，除了以前四個版顯著處理外，同時開闢四個版的「兩會特刊」^⑩。

大體上，框架理論認為框架具備了「選擇」與「重組」兩種機制。首先，由於在社會真實中，每一事件都含有多種言說可能，但是無論真實世界包含的可能因素有多

註⑧ 京華時報，2004年3月10日，第A6版，2004年3月11日，第A6版。

註⑨ 京華時報，2004年3月15日，第A8~A9版。

註⑩ 以一九九六年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人民日報除了組成五十人的「兩會」報導組外，還使用六個版。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人民日報版面備要，頁19。以本文選擇的二〇〇四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與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人民日報則動用了八個版顯著報導。

大，媒介只能配合情境因素選取一或兩項成爲言說論述內容。從選擇機制來看，沒有任何單一言說能掌握社會真實的整體意義，因此選擇機制在意義再現中顯得格外重要。其次，在框架形成的過程中，選擇機制只觸及了狹義的意義層面；言說的內涵邏輯呈現尚須倚賴「重組」機制。例如在社會言說中，新聞記者慣將某些素材置於新聞報導內容的首段、或編輯將某些「重要」新聞置於頭版，用以呈現其受到特殊重視的程度，此種方式習稱「強調」或「凸顯」，目的在讓閱聽人特別注意或特別記憶這些資訊。這些都可稱爲「重組」的過程^⑥。

事實上，透過新聞報導框架的選擇、重組機制，可以看出人民日報與京華時報對同一「兩會」重大黨政會議新聞呈現了不同的「版本」。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既然「兩會」黨政會議新聞攸關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人民日報自然在報導框架上採用「建言表態」、「誇耀成就」、「凝聚團結」、「宣示政策」，藉此營造出席委員、代表與黨國領導人齊聚一堂，各界委員、各地代表貢獻良策、普傳捷報，黨國領導人宣示政策、誇耀成就的一場勝利團結大會。但是對於目前大陸市民讀者來說，人民日報大量使用的四種報導框架，使得「兩會」新聞政治說教氣息濃厚，成爲全篇充滿高度抽象化、概念化，卻毫無實質內涵的「套話」大全。人民日報發行量的逐年降低，以及絕對比例的公費訂閱，正足以說明民衆已經對「兩會」會議連篇累牘的八股教條感到厭煩。

不過，伴隨一九八〇年代起大陸報業廣告市場的恢復與急遽成長、與其稍後「自辦發行」制度的創新，使得進入九〇年代後，一些冠以晚報、早報、晨報、時報、導報、都市報、服務報、信息報、證券報名目的市民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些市民報主要是由省委機關報在省會城市創辦的子報，或地市級城市新創辦的報紙^⑦。這些市民報在市場定位上呈現如下特色：（一）改變過去報紙以指導性掛帥，朝向實用性、服務性爲主，提供大量與市民日常生活直接相關，如水、電、天然氣、氣象、交通、就業、就醫、升學、副食品、菜籃子等實用信息服務。（二）在經濟信息報導方面，從生產者的角度出發改爲從消費者角度出發，改變計劃經濟報導爲市場經濟報導。（三）改變「黨報的補充」、「茶餘飯後」等傳統晚報的新聞價值觀，成爲滿足市民對全方位覆蓋式信息需求^⑧。同時，與省級黨報主要由公費支撐截然不同，市民報走的都是以自費訂閱爲主的路子，一般也不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在發行上予以政策支持，完全靠市場競爭。可喜的是，這些報紙的發行幾乎沒有例外全部呈上升趨勢，得到愈來愈多讀者認同^⑨。

這就使得自我定位爲市民報的京華時報，在處理「兩會」黨政會議新聞時必須另闢蹊徑，在謹守宣傳任務的前提下，爭取市民讀者注意。因此，京華時報淡化了人民

註^⑥ 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頁45～50。

註^⑦ 唐緒軍，報業經濟與報業經營（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140。

註^⑧ 李苓，「20世紀末中國新聞傳播的角度改變」，發表於亞洲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主辦，1998年6月2～4日），頁154～157。

註^⑨ 曹鵬，中國報業集團發展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頁64～66。

日報大量使用的「建言表態」、「誇耀成就」、「凝聚團結」、「宣示政策」框架，轉而以「傳達訊息」框架取代；也就是解構了傳統「兩會」新聞作為凝聚上下團結、誇耀建設成就以及合法化中共政權的「儀式性」功能。京華時報根據與會委員、代表發言，針對與北京市民生活權益有關者撰發新聞，拉近與北京市民讀者的鄰近性。

在報導方式上，為了因應日益激烈的報業商業化競爭，京華時報更引進西方報業經常採用的解釋性新聞報導、深度新聞報導、調查性報導，以吸引北京市讀者的閱讀。至於在消息來源上，京華時報也試圖突破傳統黨報固守的「兩會代表」、「新華社」作為消息主角的傳統，轉而讓市民讀者、學者專家逐步發聲，傳達不同於「兩會代表」、「新華社」的聲音。

值得關注的是，京華時報固然大量採用「傳達訊息」框架爭取市民讀者閱讀，同時解構了「兩會」報導的「儀式性」功能，但是並未全面建構對抗性的框架，例如從「兩會」代表的發言中發掘其代表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軍隊、黨派、團體等潛藏的問題，大量、廣泛運用調查性報導、深度新聞報導，藉此監督黨國政策運作。不容否認的是，京華時報仍有部份報導採用「凝聚團結」、「建言表態」、「誇耀成就」、「宣示政策」框架，佔了23.3%，更說明其無意建構挑戰黨國權威當局的對抗性框架。同樣的，京華時報雖然開始出現市民、讀者與網民的聲音，但是消息來源來自「兩會代表」與「新華社」比例仍高達48.3%，這說明官方仍然掌控「兩會」會議新聞場域的論述壟斷權。

很明顯的，大陸報業行之多年的編採制度，例如：「報業編輯方針必須遵照上級黨委」、「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等規定⁹⁰，至今仍被京華時報奉行不渝，使得該報在報導「兩會」新聞時不可能建構對抗性的報導框架。因此，在爭取自費訂閱讀者的壓力下，京華時報針對「兩會」新聞發展出一套市民消費表述的處理方式，可以說是在市場運作邏輯與黨國制約邏輯下的平衡產物。

* * *

(收件：94年3月28日，接受：94年4月25日)

⁹⁰ 陳懷林，「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為例」，新聞學研究，第62期（2000年1月），頁111~112。

A Perspective on the Expression of Urbanite Consumption: The News Coverage Comparison between People's Daily and Beijing Times on the “Two Conferences”

Yu-liang Cha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reinafter cited as the “two conferences”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assembl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minally, the Conferences are routinely held as formal meetings for the ruling Communist regime. How to cover their political manipulations correctly is the most delicate challenge for mainland party newspapers. This paper found that, by analyzing two sources of news coverage by the Beijing Times, a newly emerged urban newspaper, and the People's Daily, the official party propaganda establishment, that the latter tends to use traditional news frame for party-state propaganda. For example, “showing fidelity by making flattering proposals”, “boasting party achievements”, “consolidating national unity” and “policy announcement”. While the Beijing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uses a message-delivering frame, which is closer to city dwellers. By applying this strategy, the Beijing Times not only marginalizes the dominant monopoly frame of the People's Daily, but also successfully deconstructs the ritual functions of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two conferences.

The Beijing Times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news frame by introducing various reporting skills from the western media, such as interpretative reporting, depth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trying to convey voices different from those delivered by Xinhua News Agency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wo conferences”. Still, the Beijing Times dares not to construct news

frame which will be viewed as a menace to the ruling leadership. Instead, the paper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expression of urbanite consumption” reporting scheme, which is obviously a product of compromise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s and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party-state system.

Keywords: Mainland China's newspaper industry; news frame; party-state conference news

參考文獻

- 人民日報編輯部，**人民日報版面備要**（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7年）。
- 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
- 王天濱，**台灣地方新聞理論與實務**（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
- 王石番，**傳播內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獅書局，1996年）。
- 朱新民，**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台北：永然出版社，1991年）。
- 共黨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
-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
- 何舟、陳懷林主編，**中國傳媒新論**（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8年）。
- R. D. Wimmer and J. R. Dominick 著，李天任、藍莘譯，**大眾媒體研究**（台北：亞太出版社，1995年）。
- 李孔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位變遷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 李苓，「20世紀末中國新聞傳播的角度改變」，發表於亞洲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主辦，1998年6月2~4日）。
- 李瑞環，**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
- 李豔紅，「政治新聞的模糊表述：從中國大陸兩家報紙對克林頓訪華的報導看市場化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75期（2003年4月），頁169~171。
- 吳安家編，**中共政治發展**（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4年）。
- 松花穆林編，**中國憲法學**（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
- 胡瑞寧，**新聞寫作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
- 姜聖瑜，「深入和跳出會議」，**新聞戰線**（北京），第4期（1999年4月），頁41~42。
- 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
- 唐緒軍，**報業經濟與報業經營**（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
- 浦興祖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張裕亮，「從黨國化到集團化－大陸報業結構變革分析」，**東亞研究**，第36卷第1期（2005年1月），頁52。
- 曹長青，「語言暴力：極權統治的威懾力量－大陸報業角色分析之四」，**中國之春**（紐約），第1期（1992年1月），頁46~50。
- 曹玉玲，「中共組織簡介－新華通訊社」，**共黨問題研究**，第23期（1997年7月），頁89~98。
- 曹鵬，**中國報業集團發展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
- 陳懷林，「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為例」，**新聞學研究**，第62期（2000年1月），頁111~112。
- 彭家發，**特寫寫作**（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年）。

彭家發，*新聞客觀性原理*（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

楊孝濬，*傳播研究方法總論*（台北：三民書局，1978年）。

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

藍鴻文，*專業採訪報導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Entman, R. M., "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ntrasts in Narratives of the KAL and Air Inc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1, no. 4 (Autumn 1991), pp. 6~26.

Gitlin,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Hall, S., et al,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News: Mugging in the Media," in S. Cohen & J.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1), pp. 340~341.

Pan, Z. D. and Kosicki, G. M.,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1 (January/March 1993), pp. 55~75.

Zhao, Yuezhi, "Enter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pp. 32~39.